中性符号学的理论范式与跨学科价值

王铭玉 孟 华

摘要：本文以中性符号学核心的区分原则为线索，依托“结构—解构—重构”辩证范式，探讨其理论变革与跨学科价值。本文阐释区分、统一两大原则协同运作的逻辑：区分原则完成语符、象符等异质符号边界切分，统一原则实现符号系统融合与整合，通过文字“可说性—可看性”光谱、实物“名物关系”解析汉字、图像、实物符号互动机制，破除西方语言中心论，建立适配汉字、东方艺术的本土解释框架。研究借助虚拟偶像、算法艺术、区块链等数字案例，搭建符号类型学矩阵，为多模态、跨文化符号现象提供精细化动态分析工具。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符号研究同质化局限，推动符号学由泛化思辨转向精细实操，实现东西方符号理论对话与范式创新。

关键词：中性符号学；区分原则；语象二元性；跨文化符号学；多模态分析
DOI：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6.10.008

符号学作为探究意义生成与传播的核心学科，始终面临解释符号异质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严峻挑战。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人类表达范式的当下，传统符号学囿于“语言中心论”与二元对立框架的局限日益凸显。中性符号学继承并革新了“结构—解构—重构”的动态范式，致力于突破符号分析的固有藩篱，通过解构语符与象符的二元性，为跨文化、跨媒介的符号实践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工具。本文以区分原则为核心线索，系统探讨中性符号学如何回应数字时代的符号复杂性，重构符号研究的认知坐标，揭示符号学从理论思辨迈向实践整合的深层转向。

一、解构—重构视域下的中性符号学

“结构—解构—重构”是一组动态关联的符号思维范式，广泛渗透于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及技术领域。三者既是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分阶段刻画，亦是应对复杂系统的核心方法论。

(一) 核心关系：从对立到循环的辩证逻辑

世界的内在秩序性是认知的前提。“结构”作为秩序的基石，其功能在于对事物内

作者简介：王铭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华南符号学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545)，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204)。孟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华南符号学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54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翻译成就研究”(22AZD006)；天津市教委2022年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语言符号学的推广与应用”(2022－19)。

在逻辑进行静态描述，强调稳定性、层级性与系统性，扮演着认知起点与解释世界框架的逻辑角色。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中的能指/所指结构、[①]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皆为经典体现。“解构”则是对既定秩序的批判性反思，其核心功能在于揭示结构中潜藏的矛盾、遮蔽现象与权力关系，瓦解单一解释的权威性，质疑结构的自然性并暴露其人为建构的本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社会学者对性别结构的拆解均属此列。[②] “重构”指向秩序的再生，其功能是在解构的基础上，建立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新秩序，致力于超越二元对立，实现动态平衡。后殖民理论对文化身份的重构、开源社区对技术权力结构的重塑即为明证。[③] 概言之，“结构—解构—重构”三位一体，呈现出鲜明的共性特征：其一为递进性，结构奠定认知基础，解构揭示其局限，重构指向未来可能；其二为循环性，重构生成的新结构可能再度成为解构对象，推动知识生产的螺旋上升；其三为共生性，解构的有效性依赖结构的清晰性，重构的可行性则需解构的批判性作为前提。

（二）历史演变：从哲学思辨到跨学科实践

该思维范式的流变塑造了不同的学术思潮。20世纪中叶是结构主义的鼎盛期，其典型特征在于追求普适性规律，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亲属结构理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深层语法理论。然而，其局限性亦显而易见：相对忽视历史变迁与个体能动性，易陷入“决定论”窠臼。[④]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解构主义勃兴，雅克·德里达颠覆“中心—边缘”逻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露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催生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理论。但解构主义亦常被诟病“破多立少”。[⑤] 步入21世纪，重构范式的探索蔚然成风，强调实践导向，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重构人机关系，[⑥]复杂性科学重构系统思维，标志着从纯粹批判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转向，更加重视伦理责任与生态平衡。

（三）当代现状：数字时代的挑战与创新

数字化浪潮并未颠覆“结构—解构—重构”的三维格局，反而使其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在技术领域，以“区块链技术”为例，其“结构”体现为中心化金融系统的层级控制；“解构”表现为比特币借分布式账本挑战银行权威；“重构”则呈现为DeFi(去中心化金融)建立的新型信任机制。进一步以“算法推荐”为例，其“结构”是传统媒体“编辑—受众”的单向传播；“解构”表现为算法瓦解编辑权力，用户数据跃升为新型生产资料；“重构”则是个性化推荐催生“信息茧房”，进而激发对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的强烈需求。

---

① 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0—103页。

② 参见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③ 参见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1—33页。

④ Claude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p.3－10.

⑤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1975, pp.32－34, 171－172.

⑥ See D. A. Haraway,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ocialist Review*, vol.15, (1985), pp.65－107.该文章最初发表于1985年的《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其写作背景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的一系列事件相关。当时，哈拉维试图通过这篇文章探讨控制论和数字化如何改变人类的意义，尤其是从性别和性的角度出发。在《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提出了“赛博格”(cyborg)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由机器和生物体混合而成的有机体，它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虚构小说的产物。

在文化领域,以“模因(Meme)文化”为例,其“结构”是原始图像/文本的固定意义;“解构”表现为用户通过拼贴、戏仿颠覆原意(如“黑人抬棺”舞蹈的全球变异);“重构”则体现为形成具有跨文化共鸣的新符号体系。进一步以“虚拟偶像”为例,其“结构”是真人偶像的“人设”控制;“解构”表现为虚拟形象剥离生物性(如初音未来的用户共创);“重构”则是粉丝与技术共谋塑造的“超真实”偶像生态。

(四) 中性符号学与“三构”范式的内在关联

中性符号学(Neutral Semiotics)是笔者对当今时代中国符号学的走向以及世界符号学发展的一次范式性思考和尝试,其核心是跳出传统符号学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专门研究语言符号(语符:文字、话语)与图像符号(象符:图画、形象)交织融合的混合符号现象,也就是语象合治。中性符号学与“结构—解构—重构”范式存在深刻的契合性。它通过对传统符号系统的解构与重构,为理解与创造符号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首先,中性符号学突破了西方传统的语言中心论符号观,聚焦于围绕人类生命活动展开的多元意指实践,关注异质符号的中间性质与跨界关联。这种多元包容的“大符号观”为把握符号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提供了全新视角。

其次,在解构维度,中性符号学秉持“居中”立场,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形式与实体、系统与过程等二元对立项中寻求中间道路,着力消弭对立、淡化界限,强调语符与象符的相互解构与跨界融合。这种解构不仅打破了传统图文分治的格局,更揭示了图像符号的像似性与语言符号约定性之间的模糊地带。

最后,在重构维度,中性符号学通过“取中融合”与“居中融合”策略,实现了对传统符号系统的创造性重构。它既融汇了西方符号学中跨媒介、多媒体、多语式、语象叙事等精髓,又汲取了中国古老的“中和”“意象”等哲学智慧,提供了一种基于东西方对话与文明互鉴的新型符号学模式。

从实践层面观照,网络表情包、交通标识等现代符号现象生动体现了中性符号学的理论应用。这些符号兼具图像性与语言性,拥有双重编码特质,有效消解了传统的图文分治格局。总之,中性符号学不仅为符号学研究开辟了新方向,也为文学、艺术、语言学等相关学科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论,有力促进了跨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它本身即解构与重构思潮共同孕育的多元化理论产物。

二、中性符号学的理论支柱:区分原则与统一原则

区分原则与统一原则,类似于哲学中的分析与综合。分析旨在将整体分解为部分以深入探究,综合则致力于将部分整合为整体以把握全局。在学科构建中,二者相互补充、协同促进学科发展。

(一) 区分与统一原则的必要性

“区分原则”指依据特定方法或标准划分不同事物或概念,彰显其独特性,避免混淆。生物学中的分类学即典型,它通过区分物种建立学科体系。[①] “统一原则”指将不同部分或元素整合为有机整体,确保学科的系统性与连贯性。物理学中的统一场论尝试整合不同自然力即为明证。[②]

① 赵进东主编:《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第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244页。

② 斯蒂芬·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李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学科建立何以需要此二原则？其一，区分原则有助于学科明确研究对象的不同类别或层次，清晰界定研究范围与边界。例如，心理学区分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分支，各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缺乏区分，学科易陷入模糊，研究难以深入。其二，统一原则则确保各分支或部分间存在联系与协调，防止学科内部碎片化。例如，生物学虽划分为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等，但凭借进化论这一统一框架，有效整合各分支，形成完整体系。统一原则是构建学科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关键。语言学中，区分原则体现为将语言研究划分为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层面；统一原则则通过语言学普遍理论（如语言能力、普遍语法假设）联系各层面。社会学中，区分不同社会结构（如家庭、阶级、组织），但需借助社会理论（如功能主义、冲突论）统一解释其相互关系。

（二）原则内涵及其必要性

“区分原则”指通过明确的分类、界定或标准，将研究对象、理论或方法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或类别。其核心在于通过差异化分析，厘清学科边界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例如：生物学依据形态、遗传特征区分物种；经济学划分为微观与宏观领域；语言学分离出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等分支。一个类别通过某种特定的特征或属性来划分其子类别，这种划分原则是心理上的构想，指导我们进行物理上的分组和排列。“统一原则”指整合不同部分或要素，构建学科内部的理论一致性或系统性。其核心在于通过综合性整合，确立学科的整体框架与逻辑关联。例如：物理学通过统一场论（如标准模型）整合电磁力、弱核力与强核力；社会学借助功能主义或冲突理论解释不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历史学用其解决两个统一的问题：一是逻辑与历史统一，即哲学史与逻辑学进程是同一精神的不同表现，二是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哲学与历史学存在互补共生的关系，历史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哲学则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区分原则的必要性在于：第一，明确研究对象。区分原则帮助学科划定清晰的研究范围，避免模糊性。例如，心理学若未明确区分认知心理学与行为主义，研究焦点将难以确立。第二，促进专业化。区分使研究者能深入特定领域，提升学术深度，如分子生物学与生态学的区分深化了生物学研究。第三，避免概念混淆。精确区分不同概念可减少理论冲突，确保术语准确性，如化学中元素与化合物的严格区分。统一原则的必要性则体现为：第一，构建理论框架。统一原则将分散成果整合为系统理论。达尔文进化论为生物学提供了统一解释框架即为典范。[①] 第二，增强解释力。整合不同现象可提升学科解释现实问题的广度与深度，牛顿力学统一天体与地面运动即例证。[②] 第三，促进学科协作。统一原则为跨分支合作奠定基础。现代医学整合分子生物学与临床医学推动精准医疗发展即得益于此。简言之，区分与统一是学科发展的双翼：前者赋予学科精确性与专业性，是知识深化的基石；后者赋予学科系统性与解释力，是知识整合的纽带。二者协同作用，使学科既能深入微观细节，又能构建宏观框架，共同推动科学进步与认知边界的拓展。

（三）中性符号学中的区分与统一原则

区分原则与统一原则构成了中性符号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支柱，共同确立了其基本框架。

区分原则主要指向对不同类型或性质符号进行分类与辨别的准则。在中性符号学

① 参见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页。

② 参见伊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8页。

中,此原则尤为重要,因其直接关涉如何识别与理解各类异质符号(如语言符号、图像符号、行为符号等)及其相互关系。区分原则是中性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使研究者能够准确识别、分类符号,进而深入探究其关系与互动机制。缺乏有效的区分原则,精准的符号分析与解释便无从谈起。中性符号学的区分原则具体体现为"语象层阶"分析:识别象符与语符的边界,并深入描述象符的可视性关联度与语符的可说性关联度。

统一原则则指在符号系统中寻求与构建统一性的准则。在中性符号学中,此原则强调消解对立、淡化界限,关注符号间的相互解构与跨界融合。统一原则是中性符号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有助于构建更为完整、连贯的符号体系。寻求与实现符号间的统一性,方能更深刻地理解与解释符号现象的本质与规律,推动符号学理论的发展与应用。中性符号学的统一原则具体体现为"融合性原则":考察语象边界的消解与超越,包括时间性的语象主导型移位和空间性的语象互渗,以此揭示符号间的复杂关系与整体结构,实现对符号系统意义与功能的全面把握。

综上所述,区分原则与统一原则是中性符号学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区分原则为符号的精确识别与分类提供基础,统一原则则揭示符号间的复杂关联与整体架构。鉴于二者的复杂性,本文接下来将聚焦阐释区分原则,而统一原则另文详述。

三、区分原则的核心:语符与象符的异质二元切分

中性符号学的核心分析原则是"语象合治"(verbal-pictorial synergy),它对应传统符号学的"语象分治"。该原则坚持先区分语符(语言文字)、象符(图像形象)各自的符号属性,不抹消二者差异,着重探究两类异质符号并置、叠合、互渗,协同共建意指的运作机制,是分析超符号的主要操作路径,服务于符号系统动态平衡与多元共生的理论目标。在"语象合治"框架下,语符与象符是核心概念,分别代表了语言符号与视觉性符号的不同维度。

"语符"通常指口语、书面语及其各类补充替代系统(如盲文、手语、公共标识、数字代码等),是人类信息传递与交流的核心工具。语符具有:1. 时间线性:言语或文字依时间顺序依次呈现;2. 抽象性:常代表抽象概念或意义,需经学习理解方能掌握;3. 规约性:语言符号与其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约定俗成性。语符是语象合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象符提供语义支撑,确保视觉符号能被准确理解。

"象符(视觉性符号)"则涵盖图像、实物、仪式、行为举止等通过视觉感知传递信息与情感的异质符号。其特征在于:1. 直观性: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直接作用于感官;2. 多义性:常蕴含多重意义,确指依赖具体语境与文化背景;3. 场景指索性(区别于任意性):如交通标志、公共标识等,往往具有明确的行为指导或信息提示功能。[①] 象符在语象合治中作用关键,可增强语符表达效果,使信息更加生动、具体、易懂,亦可独立于语符传递特定视觉信息。

(一) 语符的异质性二元切分

1. 言文关系:语言与文字的异质性

传统语言学常将文字视为语言的附属记录工具,体现"同质化"倾向,却难以解释非

① 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60—63 页。

拼音文字(如汉字)的独立性。汉字作为汉语载体,本身即独立的视觉符号系统。例如,象形字"日"通过简化太阳轮廓图形表意,视觉理据性显著;形声字"江"则融合"氵"(形符,象水)与"工"(声符,示音),展现独特的构字智慧。相较之下,拼音文字(如英文)的形式主要服务于语音记录,视觉理据性较弱。①

2. 文字的二次切分:可说性与可看性的光谱

文字的"可说性"与"可看性"光谱揭示了符号系统表意机制的根本差异。此光谱不仅存在于字母文字与汉字间,更贯穿全球文字演化史,并在数字时代催生新形态。

第一,光谱一极:字母文字的说性偏向。语音中心主义长期主导语言学史,形成字母文字的"可说性霸权"——拉丁字母、阿拉伯字母等以语音记录为核心,形式高度抽象化。如英文"philosophy"拼写依赖音素组合,其希腊词源"φιλοσοφία"(爱智慧)的视觉理据已剥离。阿拉伯文"كتاب"(kitāb,书)的连写字母仅提示发音,形态无法推断语义。线性逻辑的极致体现如法语"anticonstitutionnellement"(违宪地),通过 25 个字母机械叠加表意,视觉信息几近真空。

第二,光谱另一极:汉字的看性基因。汉字保留了多层次的视觉理据。如甲骨文"日"直接描摹太阳;会意字"休"由"人"倚"木"构成场景意象;形声字"江"中"氵"为水象(形符),"工"为注音(声符),形成视听双通道表意。汉字书法更通过笔画疏密、墨色浓淡传递情感(如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悲愤笔触),超越语音束缚。②

需要注意的是,在光谱的两极之间,还往往存在着中间形态。我们以其他文字系统的光谱定位为例:苏美尔楔形文字中的象形符号(如 Dingir:表示"神"或"神圣")逐渐简化为抽象楔形笔画,可看性向可说性过渡。日文混合系统—假名(如"あ"源自"安"草书)偏向可说性,汉字"桜"保留可看性,形成独特的语象张力。玛雅象形文字字符"K'IN"(太阳)融合天体图像与音节省略,处于光谱中部。

在数字时代,符号的嬗变似乎更为急速。比如,表情符号(Emoji)"🌳"既可视作树的象形(可看性),又在聊天中被约定为"环保""自然"的隐喻(可说性)。动态字库设计可变字体(Variable Fonts)通过参数调整字形粗细、比例(如"Helvetica Now"),使字母文字获得有限的可看性表达。AI 生成艺术 Stable Diffusion(一款基于深度学习技术开发的 AI 绘画软件)根据文本提示(可说性)输出图像(可看性),重构语象互动逻辑。

3. 汉语语法与词汇的语象互动

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领域,它不仅体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还反映了人类认知和文化的特点。

一是词序与现实事件顺序的对应:在汉语中,句子结构往往遵循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来排列成分,这种现象被称为"临摹性"。例如,"我昨天去了图书馆"这句话就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了各个成分。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听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句子所描述事件的流程和背景信息。③

二是双音节复合词的形象化特征:"电脑"这样的双音节复合词通过其组成部分(电+脑)直接传达出该物品的功能特性,即它是一台使用电力驱动、具有类似人脑功能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0—12 页。

②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3—26 页。

③ 参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753 页(卷十上《叙》)。

的机器。这种构词方法体现了汉字六书中的“会意”原则,即通过组合两个或多个已有字符形成一个新的意义单元。①

三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共存:虽然某些汉语词汇如“蝴蝶”的发音对于非母语者来说可能显得比较随意,但实际上这些词汇的选择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比如,“蝴”字由虫字旁加上一个表示声音的声旁组成,暗示了这是一种昆虫;而“蝶”则来源于古代文献中对该动物翅膀特征的描述:“翅膀薄如片叶”——“枼”的本义即为“薄片”,强调的是蝴蝶翅膀薄而扁平的物理特征。因此,即便是看似随机选择的名称背后也可能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观察结果。②

4. 光谱之外:文字的未来可能性

“可说性—可看性”光谱是动态演进的文明基因。未来可能性包括:脑机接口时代,神经信号直接生成意念文字(如元宇宙“思维颜文字”),可能彻底解构可说/可看的二元性。跨物种符号学中,解码鲸歌的声波图案(可说性)与蜜蜂舞蹈的几何路径(可看性),或将重塑人类对“文字”的认知边界。在此进程中,中性符号学的区分原则兼具解剖刀与望远镜的双重功能:既剖析符号肌理,亦指引我们眺望符号宇宙的未知星域。③

(二) 象符的异质性二元切分

1. 对“象”的理解与阐释

汉语中的“象”是一个涵括图像、物象、语象、字象等多层面的复杂多元概念,它们共同构成汉语表达的丰富性。其中,图像、物象及其关系尤为关键。

“物象(实物符号)”指实际存在的物体,具有实体性,可直接感知。在艺术创作中,物象是画家描绘的对象,但需经符号化过程方能入画。“图像(上级符号)”则是对物象的表达与呈现,更具形式性,可表现为绘画、雕塑、摄影等。简言之,画家写生面对景物,但真正入画的是景物的符号化表现——图像。物象的符号化涉及选择、抽象与转化,融入文化、情感与社会意义,使之成为可被图像表达的形式。在“象”的体系中,切分图像与物象及其关系是核心,因其直接关涉艺术创作与表达的本质。图像作为上级符号,承载物象信息并融入艺术家的情感、风格与创造力,是对物象的加工与提升。④ “象”的异质多元性指不同层面“象”具有独特性质与功能(如“语象”关注语言意象,“字象”侧重文字形构),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构成涵盖人类认知与表达多方面的复杂概念体系。

2. 图像的语象二元结构

英国艺术史家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在《词语与图像》中提出,图像与语言通过“语象”(Linguistic Image)建立复杂联系。语象指图像中的语言成分(文字、符号或其传达的意义),是图语互译的桥梁。⑤

在西方现实主义油画中,艺术家们通常尽量排斥词语,强调可视性。这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图像本身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不是图像所传达的信息或意义。因此,他们的

① 参见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14 页。

② 参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582 页(“胡”字)、第 664 页(“蛱”字)。

③ 参见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 2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78—82 页。

④ 参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87—192、302—306、420—423 页。

⑤ 诺曼·布列逊:《语词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王之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 年,第 45—52、118—126、158 页。

作品往往更注重形式、色彩和构图等方面的表现，而较少涉及文字或符号。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反映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即图像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但同时也可以通过语象与语言产生联系。①

与之相反，中国传统写意画则充满诗意，更具有可说性。这是因为中国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将诗歌、书法等语言艺术融入绘画之中，使画面更具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这种表达方式同样反映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与西方现实主义油画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写意画更注重图像与语言的结合，通过语象来丰富图像的意义和表达力。②

总之，布列逊的《语词与图像》区分了词语饱满的图像和词语枯竭的图像，实际上是对图像内部语象关系的一种分析。西方现实主义油画尽量排斥词语，强调可视性；而中国传统写意画则充满诗意，更具有可说性。这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都反映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只是它们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各有侧重。

3. 物象（实物符号）的语象二元结构

任何实物符号都是可看的，同时都通过自己的解释项获得意义。解释项充当了语符的性质（写作“名”），其代表项则是象符（写作“物”）。实物符号内部的语象关系可进一步表述为“名物关系”。解释项具有回指和顺指双重性，它顺指着物象，则是象或物主导；它回指着解释项自身（词语），则是语符主导。如看到埃菲尔铁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巴黎”，这是语符主导，铁塔成为“巴黎”的象征符号，被社会词语约定俗成了。如果人们想到的是“火箭、树干、工业革命……”等等（巴尔特语），这些语言成为铁塔的解释项，后者顺指着铁塔，成为铁塔自我显象的语言手段，因此是“可看”主导的象符。在可说主导的物语中，对词语的认知先于观看，或词语主导着观看的视角；在可看性主导的物语中，实物触发词语或可看主导着语言内容。所以，象符、顺指、观看主导着写作“物/名”关系，语符、回指、言说主导着写作“名/物”关系。③

简而言之，实物符号的意义构建于视觉呈现和语言解释的交互之中，形成了一种语象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涉及两个关键要素：代表符号名称的“名”和符号所指的实际物体或自体的“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而是可以是顺指的，即从视觉到概念的直接联想（例如看到埃菲尔铁塔直接联想到巴黎），也可以是回指的，通过视觉符号引发对其他相关语言概念的联想（如从铁塔联想到工业革命、现代性等）。

类似的例子还有：顺指（物主导）——物象直接触发意义，例如，看到沙漠照片（象符）可能联想到“干旱”“生命极限”，无需语言中介；回指（语主导）——语言解释重塑物象意义。显然，在“可看主导”的情境中，实物符号的直观视觉冲击先于任何语言描述，观众首先通过视觉感知然后才是语言解读。而在“言说主导”的情况下，则是语言描述引导了人们对实物符号的认知和理解，词语成为构建和过滤视觉体验的框架。这两种关系分别用“物/名”和“名/物”来概括，揭示了实物符号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下，通过结合视觉元素和语言元素，传递出层次丰富、多元交织的意义。任何实物符号皆具有可看性，并通过其解释项获得意义。解释项充当语符性质（名），代表项则为象符（物）。实物符号内部的语象关系即“名物关系”。

---

① 参见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03、400 页。

② 参见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年，第 131、215 页。

③ 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45—52、67—75 页。

总之,视觉呈现(物)与语言解释(名)彼此交互,而实物符号的意义建构于其中。在“可看主导”情境,视觉冲击先于语言描述;在“言说主导”情境,语言描述框定视觉认知。两种关系(物/名 vs.名/物)揭示了实物符号如何在特定语境下,通过视觉与语言元素的结合,传递丰富多元的意义。①

四、区分原则的价值:异质切分与符号分析的范式革新

中性符号学的区分原则通过解构语符与象符的二元性,揭示了符号系统中形式与实体、可说与可看的深层张力,为符号学研究带来范式革新。其价值不仅在于理论突破,更在于广泛的实践应用,它在跨文化符号解读与数字时代多模态分析中展现了独特优势。

(一) 理论创新:解构符号的同质化迷思

传统符号学倾向于将符号系统简化为单一逻辑框架(如语音中心主义),忽视符号内部异质性。区分原则通过异质切分,打破了这一迷思。

首先,揭示语符双重维度:1. 可说性(形式性):关注符号的抽象性与线性规则(如英文“tree”依赖语音映射与拼写);2. 可看性(实体性):关注符号的具象理据(如汉字“森”通过三“木”叠加传递视觉密集感)。传统符号学视文字为语言附属,但汉字“日”的象形性证明文字可独立承载视觉意义,与语音脱钩。

其次,发现象符多元层级:实物符号(如埃菲尔铁塔)既是可看的物象,又通过社会约定(“巴黎象征”)或个体联想(“工业革命隐喻”)获得语言解释,形成动态“名物关系”。中性符号学证明符号系统是形式与实体、可说与可看共存的异质网络,非单一逻辑产物。

(二) 跨文化解释力:非西方符号的合法性重构

西方符号学长期以拼音文字为模板,将非西方符号(如汉字、图腾)边缘化为“例外”。而区分原则通过异质切分,赋予这些符号独立的理论地位,论证了三个观点。

一是“汉字作为视觉符号系统”的观点。比如,形声字的二元结构形符(如“氵”表水)与声符(如“江”中的“工”)分别对应可看性与可说性,挑战了语言任意性原则。二是“语法非线性”的观点。汉语“我吃饭”通过词序临摹动作时序,体现象符的“空间逻辑”,与印欧语系的形态变化形成对比。② 三是“东方艺术的符号逻辑”的观点。中国写意画中题诗(可说性)与水墨笔触(可看性)交融,形成“诗画一体”的符号互动,与西方油画的“纯视觉性”形成光谱两极。质言之,中性符号学为汉字、东方艺术等非西方符号提供了独立分析框架,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霸权。

(三) 数字时代的方法论奠基:多模态符号的动态解析

数字技术催生了虚拟偶像、算法艺术等新型符号形态,其多模态特性(文本、图像、声音交织)亟须新的分析工具。区分原则通过异质切分,为研究这些现象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一,虚拟偶像的符号生成。从“可看性”角度来看,虚拟形象通过视觉设计传递二次元文化特征。比如,“初音未来的蓝发双马尾”,这是对日本虚拟偶像“初音未来”

① 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31、191 页。

② 王力:《汉语语法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5、215—218 页。

(Hatsune Miku)标志性外观特征的描述。蓝发：初音未来的发色为明亮的青蓝色(Turquoise)，象征科技感、未来感与纯净性，与“虚拟歌姬”的数字身份呼应。双马尾：长发分束为两股高耸的马尾辫，造型夸张且富有动感，既符合二次元角色的萌系审美，又暗示其“声音载体”的功能性(马尾形似音频波形)。这一形象不仅是视觉标识，更是数字时代符号生产的典型案例。它融合技术逻辑、商业策略与粉丝情感，构建了一个超越物理世界的文化宇宙。这一符号的成功，印证了中性符号学中“可说性”(声音合成技术)与“可看性”(视觉形象)的完美协同。该形象不仅是其身份的核心符号，更成为全球亚文化中的经典视觉符号，体现了虚拟偶像文化与技术美学的深度融合。从“可说性”来看，粉丝创作的歌词、弹幕赋予其人格叙事，形成“名物关系”的动态平衡。以热门动漫为例，粉丝们通过创作同人歌曲、编写弹幕评论等方式，赋予了作品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故事背景。这些由粉丝创作的内容不仅丰富了原作的内涵，还让角色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总之，从“可说性”来看，粉丝创作的歌词和弹幕不仅是对作品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也是构建作品与观众之间情感联系的重要桥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名物关系”得到了不断的调整和发展。①

第二，算法艺术的语象互动。这是具有前沿意识，也是非常具有前途的技术路径。以 Stable Diffusion 生成图像为例。这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它能够将文本描述转化为高质量的图像，模型需要大量的文本和图像配对数据进行训练，形成学习文本和图像之间的映射关系。它的训练过程为：模型会对随机噪声添加不同程度的噪声，然后通过比较生成的图像和原始图像的差异，不断调整模型的参数，以提高生成图像的质量和准确性。简单说，用户输入文本提示(可说性)，模型输出图像(可看性)，二者通过算法实现跨模态映射。再如，NFT 的符号价值。NFT(Non-Fungible Token)，即非同质化代币，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应用形式，它代表了数字资产的唯一性和不可互换性。NFT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用于标记特定的数字资产。与比特币等同质化代币(每个代币价值和功能都相同)不同，NFT 的每一个代币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的标识和元数据，因此不能与其他代币等价互换。在数字世界中，拥有特定的 NFT 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身份标识。例如，一些以个人头像为形式的 NFT(PFP)，如无聊猿(Bored Ape Yacht Club)等，被许多人用作社交媒体的头像。拥有这些知名项目 NFT 的用户，会将自己视为特定社区的一员，从而获得一种身份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表明，区块链元数据(可说性)与数字艺术视觉(可看性)共同构建稀缺性，挑战传统艺术评价体系。由此看来，中性符号学为解析数字符号的复杂性提供了可操作路径，推动符号学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建模。②

(四) 分析精确性：从泛化到精细的范式升级

传统符号学常陷于“过度概括”或“相对主义”困境。区分原则通过层级切分与阈限界定，提升分析的深度与严谨性。

一是避免符号泛化。针对“万物皆符”观点，中性符号学秉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存在哲学，坚持“语言阈限原则”：语言首先是物之“显象”方式，未

① 参见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35—138 页。

② 参见陈永东：《人工智能艺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5 年，第 189—193、225—228 页。

被语言命名之物对人类无意义。因此,“万物皆符”的阈限条件是物已被语言命名并进入名物关系建构。未被命名的岩石仅为潜在符号,而“泰山”因文化命名成为“五岳之首”的象征符。根本上,名物之名是语符,名物之物是象符,名物关系即语象关系。①

二是提供精细化工具。核心是奠定“类型学矩阵”基础。区分原则依据“形式性—实体性”与“可说性—可看性”二维坐标系对符号进行分类,提升分析系统性(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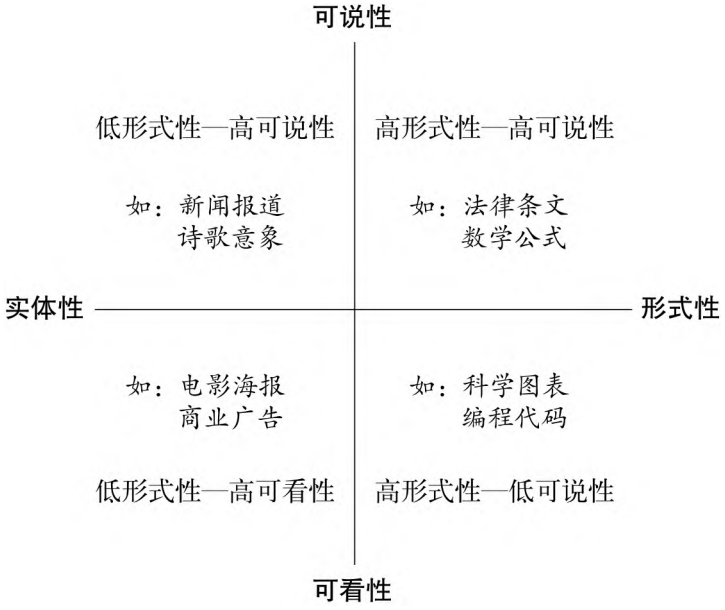


图 1 区分原则的二维坐标系

在这个二维坐标系中,横轴表示形式性和实体性的高低,纵轴表示可说性和可看性的高低。每个象限中的符号类型代表了不同的特点和属性。例如,第一象限(右上):高形式性—高可说性,法律条文、数学公式;第二象限(左上):低形式性—高可说性,新闻报道、诗歌意象;第三象限(左下):低形式性—高可看性,电影海报、商业广告;第四象限(右下):高形式性—低可说性,科学图表、编程代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类型的符号在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和特点。

可以认为,中性符号学的区分原则指向符号分析的变革与未来,它不仅是理论工具,更是一场符号认知的革新。中性符号学的区分原则通过层层解构符号的语象二元性,揭示了符号系统中形式与实体、可说与可看的永恒张力。它不仅为汉字、图像等非西方符号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更在数字时代为多模态符号研究(如虚拟偶像、算法艺术)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一理论的价值在于,既承认符号的异质性,又通过精细切分避免泛化,最终指向符号分析的深度与精确性。

结 语

中性符号学以区分原则为支点完成了当代符号分析范式的深刻革新,这套依托“区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07、197 页。

分—统一”辩证逻辑搭建的理论体系，逐层拆解语符与象符的二元内在张力，厘清符号内部可说性、可看性、形式性、实体性四重维度的复杂关联，从根基上打破长期主导学界的语言中心主义与符号同质化思维。相较于西方经典符号学偏重拼音文字、单一图文分治的分析路径，中性符号学立足中国传统“中和”哲学与汉字符号特质，先区分异质符号边界，再完成跨界融合阐释的“语象合治”思路，赋予汉字、传统书画、实物物象等非西方符号独立、自洽的理论阐释地位，补齐了现有符号体系对东方多模态表意实践解释力不足的短板。

在数字媒介全面渗透的当下，区分原则衍生的符号类型学矩阵具备极强现实适配性，能够完整拆解虚拟偶像、AI 生成图像、模因文化、NFT 数字藏品等新兴混合符号，清晰呈现文本与视觉双向转化、名物关系动态移位的表意过程，为新媒体、艺术学、传播学、计算机跨媒介研究提供标准化精细分析工具，克服传统符号研究泛化模糊、二元对立僵化的弊病。

同时，本理论作为东西方理论互鉴的产物，并未完全否定索绪尔、德里达等西方理论资源，而是在“结构—解构—重构”循环框架中完成扬弃与再造。但本文仅重点阐释区分原则，统一原则、超符号的完整运作逻辑仍有待后续专文深挖；面向元宇宙、脑机接口等未来新型符号形态，中性符号学的分析矩阵也需持续迭代优化。整体而言，区分原则支撑起的中性符号学，为世界符号学开辟了兼具本土立场与通用解释力的全新研究路径，推动符号学学科走向多元、均衡、精细的新阶段。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Interdisciplinary Value of Neutral Semiotics

Wang Mingyu, *Meng Hu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a core principle of neutral semiotics, as its central thread and explores its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value within a dialectical paradigm of “structure-deconstruction-reconstruction.” It elucidates the logic of the coordinated operation of the tw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and unification: the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delineat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eterogeneous sign types, such as verbal and iconic signs, while the principle of unification integrates and consolidates sign systems. By examining the “speakability-visibility” spectrum of written language and analyzing “name-object relations” in material objects, it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mong Chinese characters, images, and material signs, challenges the Western tradition of linguistic centrism, and establishes a localized interpretive framework suited t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Eastern art. Drawing on digital cases such as virtual idols, algorithmic art, and blockchain, it develops a typological matrix of signs, providing a refined and dynamic analytical tool for multimodal and cross-cultural semiotic phenomena.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homogenization

in traditional semiotic studies, advances semiotics from generalized speculation toward precise and practical analysis, and promotes dialogu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semiotic theories as well as paradigm innovation.

Keywords: neutral semiotics; principle of distinction; verbo-iconic duality; cross-cultural semiotics; multimod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黄艺聪**)

(**上接第** 103 **页**)

in smart community setting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major challenges in current governance: a mismatch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vision and actual needs, a disconnect betwee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al use, and a gap between digital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overnance should be grounded in the core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follow a progressive governance pathway from needs-based provision to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ultimately to capacity-building and educational feedback.

Keywords: smart community; elderly adult; digital divide; digital inclusion

(**责任编辑**: **秦川申**)